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出版社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杭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杭州道教 / 孔令宏, 韩松涛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80758-786-6

I. ①民… II. ①孔… ②韩… III. ①道教史—杭州市—民国 IV. ①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6245号

民国杭州道教

孔令宏 韩松涛 /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蓓

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786-6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忠焕

副主任 赵光育 熊恩生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新德 陈江明 张学继 项文惠 夏卫东

倪素浓 陶水木

主 编 孙忠焕

副主编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总 序

民国时期是我国纷繁错综之秋，杭州和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发展、抗战、内战和解放的历程，在历史风云的挫折蹒跚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民国杭州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城市，涌现出了众多知名人物，也发生了不少举国瞩目的大事。

1911年杭州光复，结束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随后不久杭州又成为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相继建立了政权。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杭州顺应民主和时代的潮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身近代民族工业的热情，在杭州以丝织业为主的轻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并开辟了城站新商业区和湖滨新市场，形成了都市新的商业格局。受革命思想的激励，杭城出现不少近代报刊，为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发挥了作用；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各式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浙江图书馆的创办更是杭州乃至全省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些变化与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杭州在全省的地位、在全国的影响。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光复后杭州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以及剩余旗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道路建设。这项计划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加速了杭州城市空间变化。屏障拆除之后，西湖便融入城市之中。这样，西湖从郊外

景色转变为城市景区，用当时杭州居民自己的话来形容：“西湖搬进了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浙江省政府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组建市政府，奠定了杭州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杭州建市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1929年，浙江省政府为了“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即在杭州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促进了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本次活动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被誉为中国会展业的开端。以西博会为契机，杭州开始了近代城市建设，城市外围交通路网相继建成，市政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公共汽车、自来水厂和电厂等城市公用设施应运而生，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这一时期，杭州是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品的中转地。伴随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杭州商贸日益繁荣，金融业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出现了戏院、电影院、体育场等近代文体场馆。旅游业快速发展，国内游客每年达百万以上；除政界要人、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频繁来杭外，也不乏来自外国的游客。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杭州进入八年沦陷时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就此中断。在日伪的统治下，杭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工商业受到重创，大批学校迁避他乡，文化教育设施和名胜古迹被大量破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杭州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杭州的工商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重大的发展机遇转瞬即逝。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惊人的战争费用，导致政府滥发钞票，引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金融崩溃。杭州的近代化进程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城。杭州的解放，使杭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民国杭州这段历史，尽管近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但成果还是显著的：杭城逐渐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日趋完善，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更是迈进了近代社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民国时期的执政者不愿也不敢去触碰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那时的发展是畸形的，广大的农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进行的。杭州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解读城市的历史，除了溯源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外，应将城市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综合对比研究，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历年来，杭州市政协非常重视对民国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除征集、出版大量民国“三亲”史料之外，1997年6月由第四届杭州市政协主席周峰主编的《民国时期杭州》正式出版，填补了民国杭州史研究的许多空白。2009年11月，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同民国浙江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省内外80多位专家学者对近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杭州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2010年9月，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市社科规划办合作，推出了“民国杭州研究”重点专项研究招标课题。经过专家评审，有20个项目获得正式立项。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即是“民国杭州研究”专项课题的成果展示。总的来说，这套丛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丛书涵盖了民国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二是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个特点在这套丛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和当代意识。丛书各作者期望通过对民国杭州历史的研究来为当下杭州发展的实践服务。

在这套研究丛书推进的过程中，杭州文史研究会始终坚持严格要求、高标准的宗旨，从具体每一部书的研究思路到写作提纲再到成稿，都组织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严格评审，各位作者根据评审意见数易其稿，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为了力求达到一个总的目标：要使这套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专著在学术上能够经得起检验，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民国杭州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有待于各界人士的评论指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的推出，必将对以后的民国杭州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今日杭州是历史杭州的传承和发展。民国时期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纵深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而且其所揭示的历史轨迹能够为当前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也可为杭州的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孙忠焕

2011年7月于杭州

目 录

总 序·····	孙忠焕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民国杭州道教的背景·····	004
第一节 先秦至北宋杭州道教概述·····	004
第二节 南宋至清杭州道教概述·····	015
第三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社会历史背景·····	031
第二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宫观·····	047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道教宫观概述·····	047
第二节 玉皇山福星观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069
第三节 余杭洞霄宫的历史·····	091
第三章 民国时期归属于道教的民间信仰及活动·····	100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老东岳庙·····	10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杭州公庙·····	122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组织·····	135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的道士及其经济状况·····	135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传戒活动·····	138
第三节	杭州市道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153
第五章	民国时期杭州的高道·····	179
第一节	李理山的事迹及其对道教的贡献·····	179
第二节	其他高道和道教学者在杭州的活动·····	194
第六章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影响及意义·····	199
第一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对民俗的影响·····	199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意义·····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1
附 录 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		225

绪 论

道教有1800多年的历史，但道教的研究历史却只有150多年。道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本土宗教，但最早开始对道教进行学术研究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学者。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持续不断，成果颇多，使得巴黎作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地位持续了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由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受政府的鼓励和中国热的影响，日本学者纷纷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使得日本一度成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有个别学者从事道教研究，零星地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总体来看，量比较小，研究的领域有限。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才开始大量从事道教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断言，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终于回归到道教产生的故土了。

严格意义上的道教虽然产生于东汉时期，但它的渊源则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巫术和原始宗教，并直接继承了春秋时期产生的道家哲学和稍后战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方术，经过西汉时期长时间的酝酿，到东汉正式形成，从那以后持续发展到今天。这样悠久的历史，决定了道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道教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根本信仰。这样的宗旨决定了它有一系列非常独到的特点，例如，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道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像儒家高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所以被儒生垄断的正史颇为轻视它，对它的记载不多，道士主要生

活在社会的中下层，知识文化水平总体来看不是很高，加之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对自己历史的记载和研究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有差距，存在着颇多缺憾。但是，道教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养生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事实上又把俗文化与雅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其社会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这几方面决定了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困难性。

道教具有复杂性，对它的研究颇为困难，道教研究的历史还很短，道教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却大有前途的年轻领域。既有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宏观的历史研究，虽然梳理出了道教发展的脉络，但颇为粗疏。这就要求我们把研究方式具体化：一是作断代的、分阶段的具体研究。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已经出现，但主要集中于清代以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成果很少。二是作专题研究，如宗派、人物、道教文化各领域的专题研究、道教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等。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关于道教术数、道教科仪、道教政治思想、道教法律思想、道教在国外的传播等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三是作地域性的道教史研究。这方面先有《西北道教史》^[1]出版，范围比较大，继而有《江西道教史》^[2]等的出版，对一个省的道教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作地域史研究，它的史料范围，就不再仅仅满足于《道藏》和《藏外道书》这两部大型文献。事实上对地域道教史的研究，这两部文献是根本不够用的。我们不得不把地方志、档案、文人笔记小说、报纸杂志、乡邦文献、碑刻、宗谱、宫观（寺庙）山志等都包括进来，而且，还要进行田野调查，走访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文史馆、政协文史委员会、民族宗教局（委员会）、主要的道教宫观寺庙等，对有文字资料的碑刻进行拓片，对道士和道教的知情者进行口述史的采访。这样的研究，当然会很辛苦，工作量也会大很多，在当前盛行量化考核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很聪明讨巧的方法，显得颇为迂腐笨拙。但是，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到很多前人没有找到的新材料，翔实而清楚地描述道教在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存状态，只要以严谨的学术方法进行，所产生的成果就会很有价值，不

[1] 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孔令宏、韩松涛：《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仅能够充实道教研究，而且可以丰富该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加深对该地域道教的认识，有助于政府对宗教管理和文化发展作出科学决策，增强该地域的文化软实力。

地域道教史的研究还可以缩小，并把断代史研究结合进来。本书就是把地域范围缩小到一个城市，并把时间缩短到民国时期的近40年时间里。由于道教与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不匹配，加之民国时期战争和社会动荡，新中国建立后政局变化，道教在近代急剧衰落，道教的文献资料留存下来的很少，民国时期活到现在的道士已年过古稀且硕果凋零。所以，本项研究最困难的就是搜集材料。我们已经为此尽了最大努力。所以，本书虽然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平心静气地以学术良知而论，我们问心无愧。今后如果新发现有价值的资料，我们将会对本书进行修订。

本课题的研究，缘于2007年至2010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地区与宗教社会研究所高万桑（Vincent Gossaert）研究员发起的“道士与道庙：1900—2000”国际科研合作课题。该课题选择广州、杭州、武汉三个城市作为典型进行研究，我是杭州子课题的负责人。课题已于2010年结项。2010年，我申报了杭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代杭州道教史”并获得批准，同年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撰写“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丛书”，我申报了“民国杭州道教研究”选题并获得批准。2011年，我以“浙江近现代道教研究”为题申报浙江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而获得立项。本书也是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2012年重点课题“近现代浙江道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所以，本书是上述四项课题的结项成果和进一步的延伸研究成果。本书由我拟订写作提纲，分工合作完成。浙江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韩松涛写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第五章、第六章第一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方玲女士写第三章第一节，其余章节我写。初稿完成后我作了全书统稿。我的博士生解少君协助制作了1900年杭州道教宫观寺庙的表格，研究生周珊珊协助作了附录的文字录入工作，谨致谢忱。

孔令宏

2012年7月于杭州

第一章 民国杭州道教的背景

杭州道教的历史是悠久而持续的，没有中断过。对民国时期杭州道教的研究，应该联系着此前的历史来进行，这样对其来龙去脉才会有清晰的认识。为此，在展开民国杭州道教研究之前，我们先来简略地陈述民国以前杭州道教的历史。

第一节 先秦至北宋杭州道教概述

杭州道教历史悠久。早在道教形成之前，杭州就已有不少神仙传说。赤松子，传说为神农时的雨师。今富阳赤松子山，传说为赤松子驾鹤休息之处。《咸淳临安志》卷二七《山川》载：“赤松子山，在（富阳）县东九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围四十里一百步，赤松子驾鹤时憩此，因得名。”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八《仙释》也有类似的记载：

“富阳赤松子山，相传赤松子驾鹤往来时憩于此。”桐君，传说为黄帝时的医师，因采药来到桐庐县东山，居于桐树下。有人问其姓氏，他指一指桐树，人们就称他为桐君。^[1]现有桐君塔、桐君庙、凤凰亭、桐君潭等遗迹。许由，据传是帝尧时代的名士，尧欲让位于他，许由不受而逃至箕山隐居。箕山有多处，河南登封、山西和顺、河南范县都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杭州昌化也有箕山，《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山川》载：昌化县（今杭州临安市昌化镇）箕山是许由隐居之地。董双成，据

[1] [宋]祝穆：《舆地纪胜》卷八。

《汉武帝内传》，为西王母的侍女，其故宅，据苏轼说，为富阳妙庭观。^[1]彭祖，据《列仙传》卷上《彭祖传》载，是商朝大夫，活了八百多岁。他曾隐居于杭州临安县，八百山、八百里、百岗岭等的得名均与他隐居该县有关。东汉时期，传说仙人王远（字方平）和他的神仙妹妹麻姑到他的徒弟蔡经位于杭州仙姥墩的故宅，以千钱向余杭姥沽酒喝，离开时给余杭姥药粒数丸，余杭姥服后成仙。仙姥墩在杭州府治西五里，杭州《净慈寺志》说在旧长桥东，万历《钱塘县志》外纪说在柳浪闻莺，此外，余杭西五里也有阿老墩。这是千古传唱的仙话。上述仙话传说，充分说明，在巴蜀地区之外，道教的酝酿和起源还有另一个地区，即东部滨海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在内。浙江杭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杭州道教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杭州道教，主要是部分著名道士到杭州修炼传道，其中余杭天柱山是这一时期杭州道教的重镇。

道教初创时期，五斗米道创造人张陵，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六《山川》载，出生于杭州天目山，即临安於潜镇。该镇现有张公舍、生仙山等遗迹。此说晚出，虽然其真实性存疑，但正如《江西道教史》所述，张陵的子孙有不同世系，其中一些世系即传衍于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区。^[2]这一说法，至少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道教创立后，汉晋时期，左慈、葛玄、郭文（字文举）、许迈等著名道士都到过余杭天柱山修道、传道。左慈是汉魏著名术士，曾到过杭州於潜县的天柱山。葛玄是三国时期著名道士，曾到过东阳、绍兴、定海、余杭等广大浙江地区。郭文在浙江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存有较多以其命名的遗迹。宋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四、二五《山川》提及：“余杭山，一名由拳山……《晋书·仙逸传》载，郭文举隐于余杭山，常著鹿裘葛巾……亦名郭公山，今岩室中炼药石灶犹存。”又有

[1] 《苏轼诗集》第2册卷九《富阳妙庭观发地得丹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5、436页。

[2] 孔令宏、韩松涛：《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70页。

“郭山”，也当与郭文有关。另据宣统《临安县志》载，郭文墓在郭公山。元代邓牧《洞霄图志》卷五《人物门》中有“灵曜郭真君”篇说：

“梁乾化三年七月，封灵曜真君，今临安冲虚宫，武康郭林，余杭天真仙洞亦各有遗迹。”^[1]许迈是晋代名道，在杭州民间影响很大，遗迹不少，如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附近的於潜县有“许迈宫”，“在西尖下，乃修真之邃宇也，余址尚存。居民至今呼为道士迈”。^[2]

葛洪堪称早期道教学术的集大成者，在道教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葛洪的从祖葛玄也是三国时期著名道士和道教领袖，后世道教追认他为灵宝派祖师。杭州地方志中多处记载有葛洪的遗迹，有些地方对葛玄与葛洪没有很好地加以区分，有些地方仅称葛仙翁，现将两人的相关遗迹合录如下。《晋书》本传称葛洪曾经于余杭山见过郭文举、何幼道，说明葛洪曾经在杭州停留过是无可置疑的。现存最早记载葛洪遗迹的地方志为南宋《淳祐临安志》，曰：“案乐史《寰宇记》云：杭州灵隐山旧名稽留山，许由、葛洪所隐。”^[3]稍后的南宋《咸淳临安志》、明万历《杭州府志》、明《西湖游览志》等记载更多。综合来看葛洪在杭州的遗迹主要分布在灵隐天竺、龙井、葛岭三地。

天竺山附近的遗迹，《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山水》之《城西诸山》记曰：

稽留峰 《太平寰宇记》云：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志反，故号稽留。

岩石室、龙泓洞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元献公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

炼丹井、烹茗井 晏元献公《舆地志》：天竺山下有葛仙翁炼丹井，今在下天竺寺藏院。又云：灵隐山有白少傅烹茗井。

- [1] 邓牧：《洞霄图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五九号·浙江省》，据元至大年间旧抄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 [2]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六《山川五·於潜县》，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 [3] [宋]施谔撰：《淳祐临安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一四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葛坞、朱墅 晏元献公《舆地志》：葛坞，在灵隐山，吴方士葛孝先所居也。陆羽《寺记》云：晋葛洪亦曾居此。朱墅者，梁隐士盐官朱世卿之别墅。

丹灶堂 陆羽《记》云葛洪炼丹之所（已废，姑仍从旧志）。^[1]

上述记载中所提及的陆羽为中唐人，故葛洪与灵隐稽留峰等处关系的确立可上溯至中唐。上文称陆羽撰写的《记》《寺记》，或如卷二十三引称的《二寺记》，全称为《灵隐天竺二寺记》。《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初。“晏元献公《舆地志》”，晏元献公即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为宋仁宗时人。这说明上述所引内容是从中唐至北宋时期的文献中辑录出来的。如这里所记，稽留峰曾为葛洪的居住地，灵隐寺中的丹灶堂为葛洪的炼丹之所。

关于葛坞，《咸淳临安志》录有北宋郭祥正诗：“二葛既成仙，犹存炼丹处。有时化鹤来，徘徊不知去。”^[2]据万历《杭州府志》，“二葛”并不是指葛玄、葛洪：“葛坞、葛井：稚川遗迹也，相传吴赤乌二年葛稚川得道于此，唐时有方士葛孝仙亦隐兹坞，故郭祥正诗云：‘二葛既成仙，犹存炼丹处’是也。”^[3]吴赤乌二年（239）得道的是葛玄而非葛洪，这里显然把葛玄与葛洪事迹混淆了。显然，灵隐山的葛坞曾为葛玄的居住地。

关于龙井的葛洪遗迹，《淳祐临安志》卷三十七《井》曰：“龙井，本名龙泓，吴赤乌中，葛洪炼丹于此，井有《记》，秦少游撰。……秦少游撰《龙井记》：龙井旧名龙泓，吴赤乌中，方士葛洪曾炼丹于此，事见《图记》。……”^[4]秦少游为宋代著名词人秦观，为

[1]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5页。

[2] 同上，第606页。

[3] [明]陈善等修：明万历七年刊本《杭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二四号》第6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9页。

[4]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第746页。